



新自由還是新負擔？

美國已婚婦女
育嬰期就業的趨勢

陸先恆 著



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新自由還是新負擔？

美國已婚婦女
育嬰期就業的趨勢



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新自由還是新負擔？美國已婚婦女育嬰期就業的趨勢／陸
先恆著；李瑞中、胡美珍校譯．—初版．—臺北市：政大
出版社：政大發行，2012. 07
面：公分
譯自：New freedom or new burden? trends in married
women having infants and working in the labor market:
1960-1990
ISBN 978-986-6475-19-1 (平裝)

1. 就業 2. 女性勞動者 3. 母親 4. 趨勢研究 5. 美國

542.7952

101011200

新自由還是新負擔？ 美國已婚婦女育嬰期就業的趨勢

原著書名 | *New Freedom or New Burden? Trends
in Married Women Having Infants and
Working in the Labor Market: 1960-1990*

原著作者 | 陸先恆 (Hsien-Hen Lu)

發行人 吳思華
發行所 國立政治大學
出版者 政大出版社
執行編輯 吳儀君
校譯者 李瑞中、胡美珍
地址 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 886-2-29393091#80626
傳真 886-2-29387546
網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址 10047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18號5樓
網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話 886-2-23756688
傳真 886-2-23318496
郵撥帳號 19246890
戶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話 886-2-2391-3808

排版 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 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2年7月
定價 200元
I S B N 9789866475191
G P N 1010101515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400台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New Freedom or New Burden?

Trends in Married Women Having Infants and Working in the Labor Market: 1960-1990

© by Hsien-Hen Lu

推薦導讀

Bumpass, Hauser and Palloni

婦女就業是 20 世紀美國家庭型態的重要轉變。傳統的家務分工認為婦女主要的職責是相夫教子，而社會規範則強化了這些期待。這些期待包括為了扮演好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婦女被限制在家庭中，倘若他們工作，將對（特別是年幼的）子女有負面的影響。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婦女逐漸投入有酬勞動市場，這些社會規範與期待對婦女就業所造成的障礙，面臨了重大挑戰。婦女逐漸進入勞動市場的長期趨勢其實反映了美國社會對於「妻子」與「母親」外出工作的強烈抗拒：雇主剛開始只聘用未婚女性，接著是還沒有子女的已婚婦女，其次才是子女已經上學的已婚婦女。當育有學齡前兒童的已婚婦女也投入勞動人口，婦女 M 型年齡就業率中的低谷也就逐漸被填平了。

在本書中，陸先恆的分析結合了 1960 至 1990 年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的大樣本，清楚地記錄了這段期間母親角色之轉變，並且指出造成這個轉變的重要因素。藉由聚焦在育嬰期的女性，他刻劃出這一轉變中最難以抵擋，也最精髓的因素。首先分析人口與經濟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進一步討論托育的提供、育嬰假，以及社會規範等因素。

本書重複了早期對育有學齡前兒童之職業婦女特徵的研究，但是將分析焦點置於育有年齡極小的孩子母親身上。夫妻雙方的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可預期的薪資所得等因素，影響這群婦女的勞動力參與率，進而部分解釋其勞動力參與率變化的長期趨勢。不過，此就業增長之趨勢仍有很大一部分無法被上述變項解釋。本書將社會規範指標加入上述基本解釋模型中，適切地整合既有研究的理論並加以延伸。奠基於參考團體理論，陸先恆以「丈夫的職業團體中妻子被僱用的比例」作為一個育嬰期已婚婦女在面臨是否外出工作的抉擇時，所參考的社會規範脈絡。為了因果推論，這一指標乃由前一期人口普查中，育有

學齡兒童的已婚婦女資料所建構。將此社會規範指標與學齡前兒童的幼兒托育供給變項加入前述基本模型後，本書所提出的新的模型對於育嬰期已婚婦女勞動力參與率趨勢的預測，便幾乎完全符合自1960到1990年這30年間的實際觀察值。

懷孕時期的就業及生產後重返工作崗位本身都是相當重要的，而且也是評估育嬰假之可能影響的關鍵。由於樣本數相當大，讓本書可以聚焦於分析育有三個月以下嬰兒的已婚婦女，並針對他們從生產前一年到產後重返工作崗位期間的就業趨勢進行分析。儘管這群婦女在產前工作的比率升高，但因生育而中斷職業生涯的已婚婦女比率卻減少了，換言之，即是婦女運用育嬰假的結果。

雖然美國人口普查資料沒有對「社會規範」的直接測量，但其他某些調查研究則有。本書對這些資料的分析顯示，那些不贊同育兒期已婚婦女就業的受訪者，在他們自己當了母親之後也比較不會去工作。但在調查資料所涵蓋的期間，贊同育兒期已婚婦女就業的比例增加，導致這群女性勞動力參與的急遽成長。此外，無論支持或者反對育兒期已婚婦女就業，受訪者自身的勞動力參與率都增加了，這說明經濟及其他因素對於提升這群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影響力相當強大。

至今美國育嬰期已婚婦女就業率已增加至百分之五十以上，本書所揭示的這段轉變過程便有著更深遠的重要性。此外，關於工作與家庭如何相互影響這一議題並不局限於西方社會，類似的轉變過程與改變動力在東亞社會中也已發生，並持續進行中，而這很可能是導致這些國家生育率極低的原因。經濟與人口因素的相對角色、社會規範，以及提供幼兒托育與育嬰假等與家庭有關的社會政策，都將是未來跨國比較的重要研究課題。

作者陸先恆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人口學與區位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mography and Ecology）完成此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專題研究，並取得博士學位。該研究中心乃是世界最重要的人口學研究單位之一，經費來自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補助，該研究中心提供了讓本書處理大型資料並進行複雜統計分析的軟硬體設備，也提供了絕佳的學術環境。

陸先恆是這個研究中心裡最聰穎、最富創造力，同時也是最深思熟慮且勇於挑戰的學生之一。除了在分析上的諸多成果之外，在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過程中，陸先恆也掌握了過去這30年來，社會學及經濟學領域中有關女性勞動力參與之理論文獻與經驗研究。他是一個獨特且多才多藝的人，憑藉對統計新知的強烈渴求，以及對自學電腦程式語言的興趣，得以將這些技術應用發揮。他也對歷史人口學有所涉略，並與我們其中之一的 Alberto Palloni 合作，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生命表以及死因別死亡率的估計，並發展出對於「多狀態生命表」(Multistate Life Table) 精闢且複雜之應用。而其他自學的專長也可見於他博士論文的分析當中。西元2005年他的英年早逝，對於他的同事、朋友，甚至是這個研究社群來說，都是極大的損失。否則，他毫無疑問將會在諸多研究領域中做出更多重要的學術貢獻。我們很感謝能夠得知陸先恆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將以中文出版，並讓更多讀者能夠閱讀。

Larry Lee Bumpass

Robert M. Hauser

Alberto Palloni

目錄

推薦導讀.....	i
-----------	---

1 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的長期趨勢.....	001
一、女性勞動力參與之趨勢.....	002
二、已婚婦女與擁有學齡前兒童的母親在勞動市場的工作.....	008
三、過去對育嬰期已婚婦女的研究.....	013
四、研究問題與本書架構.....	017

2 資料、方法與變項.....	019
一、資料來源.....	019
二、方法.....	022
三、變項.....	023

3 研究婦女就業整體趨勢的新觀點.....	043
一、M型的年齡型態.....	043
二、雙峰分配年齡型態的新面貌.....	045
三、結論.....	050

4 解釋趨勢——重複並整合過去的研究.....	051
一、問題意識——對萊波維茲、克勒曼（1995）的挑戰.....	052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設計.....	053
三、描述性結果：參與勞動市場的是哪些育嬰期已婚婦女？.....	058

	四、多變項的結果	067
	五、結論與討論	075
5	初婚年齡與工作經驗的影響	079
	一、婦女初婚年齡的影響	081
	二、產前女性工作經驗趨勢及育嬰假趨勢	085
	三、工作經驗與子女數對育嬰期已婚婦女就業率的影響	089
	四、結論	094
6	態度及生命週期	097
	一、研究設計與變項	098
	二、母親就業對學齡前兒童的負面影響認知與 達成意願生育子女總數的改變	103
	三、態度及生命週期對育嬰期已婚婦女就業率的影響	105
	四、結論	112
7	結論與討論	115
	一、摘要與討論	115
	二、未來的研究	118
	譯後記	121
	附錄	123
	附錄1-1、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一般均衡模型	123
	附錄2-1、人口普查資料中所使用的變項的標準化	124
	附錄3-1、各年齡層婦女勞動力參與比例（1940-1990）（圖3.1）	132
	附錄3-2、圖3.2-1、3.2-2和3.2-3的相關表格	133
	附錄3-3、婦女就業年齡型態的世代變化	134

附錄3-4、擁有不同子女年齡的16至45歲婦女的就業比例增加（1940-1990）	139
附錄3-5、在不同婚姻狀況中，擁有小於1歲子女的 16至45歲婦女的就業比例差異（1940-1990）	138
附錄4-1、16至45歲育嬰期已婚婦女的夫妻教育成就的關係（1960-1990）	139
附錄6-1、用來預測特定意向和行為的費斯賓—阿杰恩模型	140

參考文獻	141
------	-----

圖目錄

圖1.1	擁有不同子女年齡的母親其勞動參與的成長率（1970-1983）	010
圖3.1	各年齡層女性的就業比例變化（1940-1990）	045
圖3.2-1	各年齡層已婚婦女的就業比例差異（1940-1990）	047
圖3.2-2	沒有學齡前兒童的各年齡層已婚婦女的就業比例差異（1940-1990）	047
圖3.2-3	各年齡層未婚女性的就業比例差異（1940-1990）	048
圖3.3	各婚姻狀態中16至45歲擁有小於1歲幼兒的女性就業比例差異（1940-1990）	050
圖4.1	育有未滿1歲嬰兒的已婚婦女「正在工作」的比例：依據丈夫職業群體中，擁有6至17歲子女的妻子工作比例的四分位數劃分（1960-1990）	065
圖4.2	每百位不到6歲的兒童中，幼兒托育工作者平均數量的變化（1960-1990）	066
圖4.3	每百位不到6歲且其母親正在工作的兒童中，幼兒托育工作者的平均數變化（1960-1990）	066
圖4.4	育嬰期已婚婦女正在工作的比例：觀察值和預測值的比較（1960-1990）	072
圖5.1	育有未滿1歲嬰兒的已婚婦女的平均初婚年齡（1960-1990）	081
圖5.2	育有未滿3個月嬰兒的16至45歲已婚婦女中，目前正在工作和去年有工作者的比例（PUMS, 1960, 1970, 1980）	085
圖5.3	育有未滿1歲嬰兒的16至45歲已婚勞動婦女，有職業但未實際工作的比例：依生產後每隔三個月劃分（PUMS, 1960-1980）	087
圖5.4	已婚婦女在生產後三個月內的工作狀況趨勢（PUMS, 1960-1980）	088
圖6.1	16至45歲已婚婦女支持「母親工作對學齡前兒童受有負面影響」（PCWS）的變化趨勢（1970-1996）	104
圖6.2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訪談間生產的白人女性於產後一年內工作的比例：依據第一次訪談時，對「母親就業對學齡前兒童有負面影響」（PCWS）支持與否來劃分（NFS 和NSFH）	109

表目錄

表2.1	1960、1970、1980和1990年PUMS的百分之一資料，次樣本大小	021
表2.2	最年幼子女小於1歲的16到45歲已婚婦女 在勞動市場的工作比例及每週平均工時的轉變（1960-1990）	024
表3.1	16至65歲處於不同婚姻狀況的婦女就業比例差異（1940-1990）	046
表4.1	婦女產後工作趨勢在模型中未被解釋的部分（依嬰兒年齡劃分）	052
表4.2	女性就業模型中的解釋變項與依變項的平均值（PUMS, 1960-1990）	059
表4.3	女性就業與人口經濟和規範變項的雙變項交叉關係（1960-1990）	060
表4.4	驗證並挑選出育嬰期已婚婦女就業決定因素的機率單元模型（probit models）	068
表4.5	預測育嬰期已婚婦女就業的多變項機率單元模型的年度效果	069
表4.6-1	育嬰期已婚婦女就業的決定因素（在零級和選定的L&K模型的機率係數）	070
表4.6-2	育嬰期已婚婦女就業的決定因素 （在有／無州虛擬變項的最終模型中的機率係數）	071
表5.1	多變項機率單元模型預測： 育有未滿1歲嬰兒的16至45歲已婚婦女就業率（PUMS, 1960-1980）	083
表5.2	多變項機率單元模型預測：最小小孩小於3個月的16至45歲 已婚婦女於調查時正在工作的機率（PUMS, 1960, 1970, 1980）	089
表5.3	多變項機率單元模型預測：最小小孩小於3個月的16至45歲已婚婦女在調查時 受僱（擁有工作）的機率（PUMS, 1960, 1970, 1980）	091
表5.4	多變項機率單元模型預測：育有3個月以下嬰兒的16至45歲已婚婦女 正在工作和受僱（擁有工作）的機率（控制生產前一年度工作變化的效果） （PUMS, 1960-1980）	094
表6.1	預測產後工作模型中的依變項和解釋變項的平均值 （在1970和1975年兩次全國生育調查，以及1987至1988年和1992至1994年 全國家庭與住戶調查期間，育有未滿1歲嬰兒的16至45歲已婚婦女）	100
表6.2	機率單元模型預測：產後12個月內的就業率（在全國生育調查1970至1975年 兩次調查之間，以及全國家庭與住戶調查1987至1988年和1992至1994年 兩次調查之間，育有未滿1歲嬰兒的16至45歲女性）	106
表6.3	機率單元模型預測：支持「母親工作對學齡前兒童有負面影響」（PCWS）的 機率（在1970年全國生育調查和1987至1988年全國家庭與住戶調查中 16至45歲的已婚婦女）	111

第一章

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的長期趨勢

本書探討近半世紀以來，美國的已婚婦女在育嬰期勞動力參與率的長期趨勢。在本書中作者將論證 1940 至 1990 年間，只有育嬰期已婚婦女的勞動力參與率持續增加，而其他婚姻狀況的婦女，其育嬰期的勞動力參與率都沒有持續增加。1940 年代的美國，幾乎沒有已婚婦女在產後一年內有全職工作；但半個世紀之後的 1990 年，則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已婚婦女在他們最小的子女未滿 1 歲時仍有全職工作。

上述育嬰期已婚婦女的就業趨勢發展，可視為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長期增長的一個新構成要素，不過我們對於這個發展的理解不但片斷而且過時。本書運用百分之一樣本（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 PUMS）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以及「全國生育調查」（National Fertility Study, NFS）和「全國家庭與住戶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NSFH）兩筆具代表性的全國抽樣調查資料，來檢驗既有女性勞動力參與的理論對此趨勢的解釋力。由於既有理論無法適切地解釋這一趨勢，因此將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及幼兒托育的供給納入考量，提出一個新的理論來解釋造成此趨勢的力量，並刻劃出更完整的圖像。

以下先回顧有關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整體趨勢的相關文獻：首先檢驗女性勞動力參與趨勢之理論，然後將焦點放在過去的研究如何描述及解釋所有的已婚婦女及育嬰期已婚婦女各自的勞動力參與趨勢。於本章結尾，將指出該如何更恰當地思考此議題，並略述本書的大綱。

一、女性勞動力參與之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杜瑞德（Durand, 1948）的研究報告即指出，在1890到1940年間，所有婚姻狀況的女性，其勞動力參與率都逐年增加，其中增加最顯著的是來自處於生育期的已婚婦女（Durand, 1946），杜瑞德（1946）認為這個趨勢與此年齡層的女性生育率下降息息相關。在杜瑞德（Durand, 1948）與班果夫（Bancroft, 1958）各自於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所出版的兩份研究報告中都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動力的短缺，使這個時期的女性有獲得較多工作經驗的機會。雖然在1940至1955年間，美國職場上的性別隔離幾乎沒有改變，但這一歷史事件確實增加了美國社會及雇主對女性參與勞動力的接受度（Bancroft, 1958）。

隨後有學者指出，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的長期趨勢呈現先減後增的U字型，意即在近期的增長之前曾是一段長期的衰退（Goldin, 1990）。其他研究者則主張，在1940年之前，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成長並不明顯，且參與率的增加，可能源自美國人口普查問卷改進了對婦女勞動力參與的詢問方式所造成的假象（Jaffe, 1956; Oppenheimer, 1970; Smuts, 1960）。然而所有研究都一致指出：二次大戰之後，婦女就業率的增加不但快速且持續（Bancroft, 1958; Davis, 1984; Durand, 1946, 1948; Goldin, 1990; Moen, 1992; Oppenheimer, 1970; Waite, 1981; Smith and Ward, 1984, 1985; Shank, 1988）。從1950至1990年，婦女佔總體勞動力的比例每十年就增加約10%。郭登（Goldin, 1990: 10）指出：「假使婦女的勞動力參與在過去的一百年並未擴張，美國總體勞動力參與率將（從1890年的52%）降至1987年的46%」。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快速增長，部分反映了1920及1930出生世代的生命歷程。在本世紀初，女性工作者通常年輕且未婚。當時若無特殊的經濟需求，婦女一旦結婚就離開勞動市場。二次大戰開始，由於戰爭期間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及戰後經濟的快速成長，婦女「年齡別就業率」的分配便從過去集中在年輕未婚時期的單峰分配，轉變為兩個眾數的M型分配（Shank, 1988; Waite, 1981）。許多年輕婦女曾經在二次大戰期間獲

得工作經驗：其中大多數的女性在戰爭一結束便離開工作，但幾年後又再度回到有酬勞動市場（Goldin, 1990; Shank, 1988; Waite, 1981）。M 型雙峰的婦女年齡別就業型態延續到之後的出生世代，直到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55）為止。嬰兒潮世代以降，婦女年齡別就業型態從雙峰分配轉變成單峰的高原型態，這高原型態呈現了從年輕一直持續到生育時期的高就業率（Smith and Ward, 1985; Waite, 1981）。

在 20 世紀的美國社會，各年齡層女性的就業比率皆持續增加。唯一例外的是 25 歲以下的年輕女性，於 1940 到 1960 年間呈現下降的趨勢（Waite, 1981; Smith and Ward, 1984, 1985）。在 1950 及 1960 年代，幾乎所有女性工作者在有了子女後即離開勞動市場（Sweet, 1973）。與前述研究所提出的按照世代劃分的年齡別就業分布模式一致，不同時期的美國女性工作者所呈現的年齡別分布模式一直到 1980 年都呈現 M 型。就在女性就業率的年齡分布模式隨著年代從 M 型轉變成一個持續的、倒 U 字形的高原型態的同時，男女就業人口比率的差異亦隨之縮減（Masnick and Bane, 1980; Shank, 1988）。

雖然就業女性每週工作時數往往少於就業男性，但大多數的婦女仍是全職且全年工作（Shank, 1988）。寇門及潘可非（Coleman and Pencavel, 1993）的研究發現，自 1940 年以來，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增加的幅度，遠大於其「每週工作時數」或「每年工作週數」增加的幅度。近幾十年來，就業女性的工作時數相對來說是穩定的。

對於女性勞動供給在近幾十年「如何」與「為何」成長的解釋，有來自經濟、人口以及社會的成因。我在此對過去的研究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一）女性工作者的薪資

經濟學家認為女性勞動力參與的成長乃是反映勞動市場的供需平衡，並主張過去近幾十年的主要改變是由需求增加所致。閔社（Mincer, 1962）以降的研究（如 Bowen and Finegan, 1969; Cain, 1966; Hill and O'Neill, 1992; Smith and Ward, 1984, 1985）都指出，1890 年之後，女性勞動力供給增加的長期趨勢，主要肇因於需求曲線的改變，而非有彈性且相對穩定的供給函數。女性工作者

的薪資水準，以及家庭其他收入來源，特別是丈夫的收入，都被用來估計影響需求與供給之作用力。¹

假設平均「(家庭)收入效果」高於「(女性)薪資效果」，我們會看到一個後彎的供給曲線。而此條件的成立，在於排除女性薪資及家庭其他收入來源之後的淨邊際供給彈性（即在附錄 1-1 的 S^* ）很小或等於零。運用橫斷面的個人資料，龍格（Long, 1958）發現收入效果大於薪資效果。假設其發現為真，而且 S^* 很小或等於零，那麼長久下來，薪資的長期增加應導致女性勞動力的減少。然而美國女性勞動力實際上是長期成長，龍格對此感到困惑，因此他指出這個 S^* 必定很大，譬如科技發明（如洗衣機）或其他的改變減少了婦女做家事的時間並增加其勞動力供給。

閔社（1962）則指出，龍格（1958）之所以看到較高的收入效果，是因為他混淆了「永久性家庭收入」和「暫時性家庭收入」。² 雖然已婚婦女的勞動力供給也與暫時性家庭收入的改變呈負相關，但長期的女性勞動力供給主要由永久性家庭收入所決定。由於暫時性收入效果不影響長期勞動力供給，因此龍格（1958）的橫斷面研究高估了收入效果。將永久性收入與暫時性收入區分後，閔社及其合作者發現了更強的薪資效果，而女性薪資的效果也大於（或至少等於）家庭收入的效果。³ 史密斯與華德（Smith and Ward, 1984, 1985）將閔社對已婚婦女的模型運用到所有女性。他們指出，女性薪資的長期成長解釋了自 1950 到 1980 年間，女性勞動力供給當中約 60% 的成長趨勢。亦即婦女薪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女性勞動力供給即擴充約三分之一個百分點。

然而閔社此一早期研究及其後來的跟隨者所作出的結論，並沒有將美國近幾十年來收入及薪資兩個因素其「效果本身的變異」納入考慮。郭登（Goldin, 1990）提醒我們要注意收入效果及薪資效果本身的改變，並指出，自 1900 到

1 請參見附錄 1-1 對勞動力供給之供需函數的討論。對育嬰期的已婚婦女之就業比例的薪資及收入效果之討論請參見第四章。

2 對永久性及暫時性收入的區別，其理論源起請參見費德門（Friedman, 1957）的消費理論。

3 這也就是說在註腳 1 所提及的附錄 1-1 的史勞斯基（Slusky）等式中的 $\alpha \leq 1$ 。閔社（1962: 69, 92）雖沒有明說，但假定 $\alpha = 1$ ，即 $\eta = \eta^* - \varepsilon$ 。

1980 年間，收入效果及薪資效果都隨時間遞增而遞減。但因為女性就業者的薪資在 1980 年之後更明顯增長（O'Neill, 1985; Smith and Ward, 1984, 1985），所以縱使單位薪資成長的效果降低，女性總體的勞動力供給仍持續增加。

況且，收入效果及薪資效果的大小不僅不能由單一經濟法則來決定（Mincer, 1962），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些經濟因素的社會面向。正如同收入效果及薪資效果可能在不同的社會中而有所不同，這些效果也可能隨社會變遷而改變。譬如，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對家庭的社會連帶強於對勞動市場的社會連帶，那麼收入效果便可能大於薪資效果；相反的，對家庭的社會連帶若較弱，則可能導致較大的薪資效果。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嚴格地區別「經濟」與「社會」效果，而是收入效果與薪資效果的改變總是涉及不同社會制度與社會團體間的交互作用。不管是作為改變收入效果與薪資效果的原因或結果，社會變遷的方向、差異性及速度都和收入及薪資效果的大小同等重要。此外，「薪資效果大於收入效果」這個發現也指出，此時期勞動市場對已婚婦女的吸引力乃是獨立於他們丈夫及家庭的經濟狀況。

（二）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

過去對女性勞動力參與的研究強調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的重要性，無論是對於婦女薪資水準的改變（Cain, 1966; Smith and Ward, 1985），或是女性勞動力參與的改變（Goldin, 1983, 1990; Leibowitz, 1975; Michael, 1985; Sweet, 1973）。工作經驗和教育程度代表女性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因此女性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水準的增加都將提升其收入的潛能與市場接受度。⁴ 由於薪資對於婦女就業很重要，因此收入潛能的提升將間接提升女性勞動力參與。

史密斯、華德（1985）的一個重要主張是，女性工作人口的平均工作經驗（以工作總年數計算）在 1920 至 1980 年間並沒有什麼變化，甚至在 1980 年還稍低於 1920 年。這是因為在這一大大段時期進入勞動市場的女性多數鮮有工作

⁴ 工作經驗對薪資的效果已知不是直線，史密斯、華德（1985）發現從第 20 年之後的工作經驗不再有影響效果。

經驗，因此女性勞動力參與的增加反而降低了現職女性工作者的平均工作經驗。這一主張部分解釋了為何此時期男女薪資差距並沒有明顯降低。⁵ 不過就美國所有婦女的工作經驗而言，其趨勢是明顯增加的。在1980年後，所有婦女工作經驗的長期增加最終也縮小了男女薪資的差距。

根據史密斯、華德（1985）的估計，女性的平均教育年數隨出生世代而提高：從1866至1870世代的7.2年，到1951至1954世代的12.7年。到了1979年，進入大學的女性已多於男性（Waite, 1981）。麥可（Michael, 1985）估計在1950到1979年之間，女性勞動力參與成長的24%可歸因於人口中教育組成的改變，52%來自教育效果改變對特定教育程度之女性勞動力參與的影響，而最後的24%則來自二者的交互作用。

（三）子女狀況

直到20世紀初期，美國社會規範依然認為「好母親」在孩子年幼時應留在家裡當全職母親（Davis, 1984; Goldin, 1990）。⁶ 經濟學家則認為照顧子女耗費時間精力，因此生養子女會降低女性勞動力參與。

不論社會規範的解釋或是經濟學的觀點何者較為適切，橫斷面的研究都顯示，是否育有子女、子女年齡及子女個數皆與婦女勞動力供給呈負相關（如Browning, 1992; Cain, 1966; Hill and O'Neill, 1992; Sweet, 1973; Waite, 1980）。雖然育兒與就業間的因果關係尚未有定論（Waite and Stolzenberg, 1976; Stolzenberg and Waite, 1977; Smith-Lovin and Tickamyer, 1978; Cramer, 1980; cf. Sweet, 1982），針對婦女勞動力參與率長期趨勢的研究已發現，生育率的下降

⁵ 雖然本研究的目標不在於解釋薪資性別差距的改變，但還是該指出一些研究並不同意僅用工作經驗去解釋薪資性別差距的取向（如Sørensen, 1990; England, 1992）。譚康榮（Tam, 1997）的研究支持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假設，強調在解釋男女薪資差異時工作經驗及技術的重要性。然而我們需要更多研究去了解限制女性取得或不能取得某些特定人力資本的社會過程及生物基礎。

⁶ 歷史研究指出在美國及其他工業化的西方社會，所謂「傳統的」女性性別角色其實並不傳統，而是在工業革命之後，20世紀初期形成的（Davis, 1984; Goldin, 1990）。在工業化過程中，經濟活動從家庭移轉到工廠或公司，使得工業化初期，已婚婦女從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角色中逐漸被邊緣化（Berch, 1982; Bonvillain, 1997; Davis, 1984; Mathaei, 1982; Goldin, 1990; Tilly and Scott, 1989）。